

宋代五大名窑及复古风尚

杨桂梅

五大名窑之定窑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在宋代属定州管辖，曲阳窑瓷器的销售集散地在定州，因此曲阳生产的瓷器被人们称为定州瓷。

定窑从唐代开始创烧，当时模仿名满天下的邢窑而烧制白瓷。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白瓷质量已具有相当水平，官府曾派有专门的窑窑务使在此收瓷器税。这一阶段的定窑以烧白瓷或白中闪青的青白瓷为主，以柴为燃料。器形有碗、盘、盏托、壶等。碗口均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与邢窑碗相同。

到了宋代，定窑的崛起替代了邢窑，定窑白瓷成为名满天下的白瓷产品，其工整素雅印花产品成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北宋定窑以烧白瓷为主，装饰工艺有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

1969年，位于河北定县的北宋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先后因施工而被发现，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其中瓷器有170件，均为定窑的产品，有碗、盘、杯、碟、盏托、洗、瓶、炉、盒、罐、净瓶等。这两个塔基分别建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北宋至道元年(995年)，为北宋早期。

这两批定窑瓷器，是目前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北宋早期定窑出土瓷器标本，也说明在北宋早期，定窑白瓷产品已经是上等瓷器，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流行。

五大名窑之汝窑

汝窑瓷器因文献中北宋官窑专用瓷的记载以及清官皇家旧藏而闻名，目前流传世世的汝窑完整器不足百件，多收藏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因此汝窑瓷器因其“官窑”身份及存世稀少而身价倍增，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中最名贵的瓷器之一。

找到汝窑的窑址曾是陶瓷学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在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附近找到了汝窑的窑址。1986年至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区域进行了6次发掘，发现窑场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找到了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揭开了汝官窑的神秘面纱。不仅传世汝窑器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同的瓷片标本，还发现了一些传世品中不见的器型，例如莲花钵、荷叶碗等，同时还发现了传世品中未见的装饰有纹饰的器物，其中以莲纹最常见，更有鸟、龙形瓷塑，十分罕见。

汝窑瓷器胎质坚硬细腻，呈香灰色；釉色润泽，釉中加有玛瑙末。釉色有卵白、天青、豆青、虾青等，其中以天青色、天蓝色最为珍贵。一般为满釉烧，底部有芝麻大小的支钉痕，一般小器物有三个支钉痕，大器物有五六个支钉痕。器型以盘、碟较多，另有碗、洗、三足樽、瓶、尊、水仙盆等。

目前收藏汝窑器最多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约有23件，均为清官旧藏，其中13件底部刻有乾隆御题诗。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其官窑器稀缺珍贵，不仅促生了明清官窑仿制之风，在收藏热的今天，汝窑瓷器的仿制形成了一个产业，既有仿古造假，也有生活实用器的开发，以满足爱汝之人的需求。

五大名窑之官窑

南宋人顾文荐老年闲居之时所作《负喧杂录》中有一句关于北宋官窑的记录，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是指宋徽宗政和至宣和(1111年至1125年)年间，朝廷在汴京(河南开封)设置了专门的窑场，被称为官窑。但是这个官窑遗址的寻找几乎不可能，因为千年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整个北宋汴京城已经深埋地下。没有考古资料的佐证，关于官窑的猜测众说纷纭。北宋官窑窑址目前仍是考古学家们探索的目标，而南宋官窑的面貌随着杭州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的发现而揭示出来，即五大名窑中的“官窑”。

杭州老虎洞官窑的制坯原料直接取于附近的山坡，由于含有紫金石，氧化铁的含量高，高温烧制后胎色较深，主要为深灰、浅灰和灰黑色，有的口沿和足沿露胎处呈紫黑色，俗称为“紫口铁足”。釉层较厚，釉色以灰青居多。器型主要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期，目前全国发现的宋代瓷器窑址遍及130多个县市，可以用“遍地开花，区域特色”来形容宋代的瓷器生产，五大名窑在宋代就已是藏家追捧的对象。宋代瓷业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瓷器行业前所未有的壮大，形成了许多名窑名品。二是开创了陶瓷美学新境界，瓷器重釉色之质感，重釉色之沉静素雅，如芙蓉出水，给人一种宁静、含蓄、圆融的理性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意识。



▲北宋钧窑花盆



▲北宋汝窑青釉莲花钵

有碗、盘、碟、洗、盏、盏托、杯、钵、罐、盒、盆、瓶、壶、炉、尊、觚等，其中浅腹圆洗、折肩瓶、三足奩式炉、圆形套盒等器与汝官窑的器型几乎一致。老虎洞窑窑炉为龙窑，基本延续了汝窑的工艺，只是制作上更加精细。老虎洞窑的装饰方法减少，只有见于碗盘外腹部的刻花和套瓶的镂孔两种，花纹也只有莲瓣纹和缠枝花纹，更多的器物以釉色取胜，发展出厚釉的装饰效果。

郊坛下官窑是南宋建立的第二个官窑，位于杭州上城区乌龟山西麓。1985-1988年，考古部门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全面揭示了郊坛下官窑的面貌。郊坛下官窑始建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淳熙六年(1179年)间，此时南宋政权已逐步稳定，官窑用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郊坛下窑已采用多次素烧、多次上釉的工艺生产薄胎厚釉青瓷，把青瓷的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产品胎质细腻，胎土是以瓷石加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较高。提高铝的含量能提高抗变形能力，使胎壁更薄；而氧化铁含量高的胎土色深灰(黑)，色调深沉，有利于釉面的玉质感。器型种类齐全，满足宫廷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器物以素面为主，花纹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模印、堆贴、雕镂。纹饰主要有莲花、牡丹、蕉叶等植物纹；龙、凤、兽面等动物纹；弦纹、回纹、云雷纹、乳钉纹等仿古纹饰。

传世的官窑器主要是清官旧藏，目前主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约107件)、有乾隆御题诗约20件)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约27件)。国家博物馆收藏的3件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是目前少有的几件墓葬出土的官窑青瓷器。

钧窑瓷器自创烧以来，就以其惊艳的釉色和千变万化的窑变而备受喜爱，元明清三代官窑均有仿制。钧窑特有的素烧并多次施釉的



▲南宋官窑青釉贯耳瓶

镇一带，钧窑瓷器以艳丽的窑变釉和温润的乳光釉而闻名于世。高温铜红彩和铜红釉的创烧，是对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贡献。铜红釉还采用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窑炉的还原气氛中形成红色，器物表面釉色青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后来发展形成的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在当时其他窑口所不及的，形成钧窑独特的风格和成就。北京和台北两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钧窑器中有很多出戟尊、底部带编号的花盆、鼓钉洗、海棠盆等代表性陈设瓷，色彩艳丽多变，成为钧窑代表性器物。

钧窑瓷器自创烧以来，就以其惊艳的釉色和千变万化的窑变而备受喜爱，元明清三代官窑均有仿制。钧窑特有的素烧并多次施釉的

厚釉工艺，形成一种乳浊玻璃质感的釉层，配以艳丽而自然交融的色彩，造就了钧瓷与众不同的神韵与气质。18-19世纪，西方在学习并仿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对钧窑窑变技术仿制的成功，成为西方制瓷技术进步的一个阶梯。

五大名窑之哥窑

哥窑虽然列为五大名窑，但其具体窑址和面貌在陶瓷学界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哥窑的信息主要来自文献中的记录。哥窑被列入五大名窑源自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撰的《宣德鼎彝谱》，书中有云：“……内库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

目前对哥窑器物的认识主要来自传世的收藏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海外收藏机构。传世哥窑器的显著特征就是釉面开片，呈现出“金丝铁线”般网状，即较粗的黑色裂纹线条交织着较细密的红或黄色裂纹线条。釉面开裂原本是瓷器烧制中的缺陷，这种缺陷产生的独特美感，让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并在生产中掌握了人为让釉面开裂的技术。

哥窑窑址在何处?这是一直牵动陶瓷学者的一个谜团。虽然目前发现了几个类似哥窑产地的窑址，但是与传世哥窑器对比后仍不能确定其为哥窑遗址。哥窑窑址的探寻和争论仍在持续中，哥窑瓷器的独特风格和美感自面世之日起就一直被人们追捧，元明清三代对哥窑瓷器均有仿制，明成化、清乾隆等时期都有精美的仿哥窑瓷器流传下来。

复古风尚——宋代仿古瓷器

宋代瓷器中出现了大量仿周青铜器、玉器的礼器，成为宋代文化内涵中重要的一环。

北宋初期，朝廷宗庙祭祀追求恢复“三代之典”，北宋学者夏崇义编撰的《三礼图》正是顺应了这种需求，这可以看作是宋代瓷器仿古制作的先声。随后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著的《考古图》以及北宋徽宗时期，设置礼器局，建造宣和殿，向民间搜求古器，宋徽宗下令编撰《宣和博古图》，把仿古风尚推向了高潮。

古器物学兴起的另一个根源，是宋代理学思潮的兴盛，理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儒家的礼治。宋代实行“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德致治”的统治政策，文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文人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程式化生活方式，以此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其喜好和审美需求左右了时代风尚，成为仿古风尚的推动者。宋代文人书房陈设中，花瓶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器皿，仿古瓷花瓶是这种礼器生活化的表现。睹物怀古、寄托理想的情怀不仅影响到文人对器物的审美，对当时瓷器产品的设计制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代使用陶瓷礼器的时间大约在北宋中后期，宋神宗元丰元年，为了表示祀天“尚质贵诚之意”，祭器中如簋、尊、豆等使用了陶瓷器。南宋高宗中兴复古，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成立礼器局，大量使用陶瓷礼器，将仿古陶瓷推向了顶峰。官窑仿古青铜礼器瓷器的制作，以及各阶层好古风尚的蔓延，也带动了民间窑场产品设计的变化，如鬲式炉、簋式炉、鼎式炉、贯耳瓶、觚式瓶等仿古瓷器也成为民用产品的一部分。炉是用于焚香的器皿，瓶、壶多用于插花。

宋代瓷器模仿铜器的造型和装饰是带有普遍性的，五大名窑及民间窑均烧制仿古瓷器，使用范围遍布大江南北。目前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宋代仿古瓷器的来源一是清官旧藏，二是墓葬、遗址、窖藏出土的。仿古瓷器的风尚一直延续到明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崇尚文治，历届君王都酷爱文化艺术，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更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好古尚古之风自官窑开始，逐步蔓延至民间，仿古瓷器成为宋代瓷器中独具特色的一类。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共产党人》：“专门的党报”

唐楚昌

1939年10月20日,《共产党人》创刊于延安,每月底出版一期,1941年8月停刊,历经一年零十个月,共出版19期,刊发文章196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权威性党内理论刊物。

“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必要”

在《共产党人》创刊之际,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并欣然题写刊名“共产党人”。毛泽东指出:“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刊物,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时机中,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必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为了使党的组织能力能够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组织不断扩大,但许多奸细和投机分子也随之混入党内,党内思想受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影响了党组织的巩固。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重心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由抗日转向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限共”“反共”,更在思想上宣传反共观念、制造反共舆论,对中共党报的发行出版严密监视,百般阻挠。

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而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的”“广大群众性的”“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党人》应运而生。

鲜明的办刊特色

《共产党人》版面严肃简约。每期首页目录都整齐地列出所刊文章题目,除第16、17期外,每期刊物目录还另设一至两个专栏,主要有专载、转载、通讯、通讯调查、支部工作通讯、干部教育通讯、边区乡村工作通讯、学习通讯等。刊物正文采取竖行,从右至左的阅读版式,在一些文章的结尾处,若有1/3以上的版面剩余,则会引用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或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部分内容,既保持版面的整体性、充实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

《共产党人》办刊态度灵活却不失严谨。创刊之初,编委计划每月底出版一期,1939年12月之后,在抗战形势、紧缺油墨、印刷困难等客观条件的局限下,其编委秉持宁缺毋滥、灵活机动的态度,不再固定发行周期,多则每月发行二至三期,少则数月一期;每期刊物容量也没有固定限制,多则有8万余字内容,占80余页篇幅,少则只有50页。

每期刊物的内容均由编委筛选审核后,确定10篇左右文章,统一进行排刊出版。文章内容若有错误,后续刊物会发表更正声明,体现严谨求实的办刊准则。

《共产党人》内容充实广泛。刊物所发文章主要为两大类,一是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青委等发布的党内文件,涉及关于党的组织结构、纪律建设、支部工作、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整风审查、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民族问题、财经问题、宣传鼓动等许多方面的系列重要指示和决定。二是党内同志撰写的关于党的建



▲《共产党人》创刊号 河北省档案馆 藏

设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的文章,既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具有理论指导价值的文章;也包括介绍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经验、树立模范典型的文章;还有基层工作人员叙述根据地实际发展情况的工作汇报,以及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所作的涉及乡村经济、阶级关系、支部教育、民族状况、干群关系等方面的通讯报告。

《共产党人》读者群体明确。编委会在创刊号中发布启事明确说明:“《共产党人》是党内刊物,只限于党内同志阅读。《共产党人》是非卖品,不得向党外出售,凡是读《共产党人》的每一个同志,都应好好保护它,不得遗失。”凸显了《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公开出版发行刊物的特殊性,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刊布了大量关于党的机密和重要政治文件,仅限于党内同志阅读学习。因此,该刊保密要求严格。

第15期《怎样保守〈共产党人〉的秘密——读者来信》一文指出:“它是目前党内唯一的工作指导性质的重要秘密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共产党人》的保密性质,要求所有党员需承担起对《共产党人》保密的义务,严格按照收发、传阅程序,禁止“像阅读党的公开刊物《解放》似的”在群众面前阅读,不得向党外人员传借、传抄,明确指出:“注意它的安全,也就是注意党的安全。”将保护刊物安全、保守刊物秘密上升至关乎党的安危乃至革命成败层面,极端强调了保守《共产党人》秘密的重要性。

“专门的党报”

《共产党人》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权威性党内理论刊物,首要任务即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共党员开展党的建设。《共产党人》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党的建设”明确为“伟大的工程”,并在出版发行过程中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为什么建设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问题;首次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相结合,综合全面、系统权威地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建设纲领;首次提出了“三大法宝”论断,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详尽阐释了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首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创造性地阐释了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中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41年8月,《共产党人》出版至第19期后停刊。

在不到两年的发行时间里,《共产党人》以其独特的定位、鲜明的特色、明确的主旨,用严肃简约的版面、充实广泛的内容、朴实庄重的语言,对统一全党思想、明确政治方向、巩固党的组织、指导党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号: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香港苏富比将拍卖两件重要古代书画作品

本报讯(记者 付裕)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日前表示,其2022年香港古代书画秋季拍卖将由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及巨然《山川归渡图》(又名:溪烟远岫图)两幅重要作品领衔。两者皆流传有绪,海内外出版众多,前者为画家经典之作,极具诗境;后者罕见于艺术市场。

其中,萧云从(1596年-1673年),擅画山水,宗法元人,自成一派。此《青山高隐图》绘制于1649年,尺幅有逾8米之长,画面恢弘,笔墨表现充实,表现画家心迹在元代文人画的理念的参照下,融入对自然山

水的观察体悟。此画几经名家之手,出版著录包括《古缘萃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历代著录书画》《木犀庵明遗民画二十家》等。

巨然为钟陵人(今江苏南京),五代十国南唐画家,早年即出家为僧,以画山水有名师于时。其笔墨清润而风格多变,多以长披麻皴作崇山峻岭,配以秀木矾头,写出江南的天然风景。此《山川归渡图》(又名:溪烟远岫图)大约明末清初自内府流出,为汪孟邹所度藏。曾于1929年“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出,弥足珍贵。

宝藏物语



此鼎(甲)

董家村1号窖藏共发现此鼎3件、此簋8件。虽然这8件铜器的铭文内容基本一致,但其风格、行款却不尽相同。铭文行款分为两种:一种每行10字共11行,另一种每行11字共10行。字体风格也分为两种:一种铭文文字笔画稍粗,布局疏朗,纵横皆有行列;另一种则字体稍瘦长,多用圆笔,笔画较细。

▲此鼎(甲) 西周晚期 1975年岐山县京当公社董家村1号窖藏出土